

论《日瓦戈医生》的自传性

童真

(湘潭大学 中文系,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通过比较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中的主人公日瓦戈的政治观、历史观、人生观、艺术观以及两人的性格特点,可以看出,他们虽然在生活经历和背景方面有很大差异,但在内在气质、精神方面有惊人的相似,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帕斯捷尔纳克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日瓦戈。

[关键词]帕斯捷尔纳克;自传性;《日瓦戈医生》

[中图分类号]I5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1—0055—05

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曾说:“我一直想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它就象一次爆炸,我可以在爆炸中把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和懂得的所有奇妙的东西都喷发出来。”[1](69页)他抱着这样的宗旨创作了《日瓦戈医生》[2]。《日瓦戈医生》的问世确实象一次爆炸,震撼了整个文学界,成为东西方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冷战中的一个焦点。作者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因此被开除出苏联作协,背上了“反革命、反人民、反艺术”的罪名。

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爆炸,只因为作者从全新的独特的角度,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认识来反思十月革命前后这一重大历史时期。传统的描写革命时期的作品总是在历史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通过描述个人的命运、个人的活动来反映时代主流,表现时代精神,展示历史发展,此外还着重揭示革命对人的熏陶改造,以及由此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在这些作品中,人总是作为政治的产物出现的,人的行动与感情是由社会和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日瓦戈医生》则避开对政治、经济等方面新出现的具有重大意

义的历史事件、时代正题的描述,避开用时代占主导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公理为价值主体来记述与评价人物活动的陈套,专注于个人的内心世界,专注于自然、生命、爱情、死亡等永恒的主题,专注于人的本质在历史变幻、社会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命运中所呈现的种种形态,并以人的思想感情、创造力和审美理性中不可变更的根本素质为准则来估价世态人事。人的生活小说中既不说明历史事件,也不反映时代精神,主人公是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单一性、自主性和理性价值的独立存在来描写的,他以自己的本能、感觉、知觉和思想去接受生活,并产生或和谐、或平衡、或抗拒的种种反应,令人读来就好像一个人在自我回忆、自我反省的同时,站在自我存在的角度,大胆地披露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独立性。

事实上,这部小说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自身命运和经历的感情折射,是他平生对哲学、历史、伦理道德和艺术创作的思考和总结,是他独立探索真理、凛然傲世的精神展示。正如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利哈乔夫所说:“《日瓦戈医生》甚至并不是一部长篇小说

[收稿日期]1999—05—26

[作者简介]童真(1965—),女,四川乐山人,湘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说,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自传,一种令人惊奇的形式使作品缺乏同作者的现实生活相一致的外部真实的自传。”作者“为自己虚构了一个可以在读者面前充分地揭示自己内心生活的命运”[3](14页)。其实,凡是熟悉和了解作者生活和思想的人,只要读一读《日瓦戈医生》就会发现,小说的主人公日瓦戈几乎就是作者自身的翻版。虽然他们的生活背景和经历不尽相同,但是在人物的气质和精神等诸方面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极度敏感、易于激动、热情奔放、对生活充满了爱的诗人。他们都精通文学、历史、哲学,都有出众的知性,对人生、宇宙的真谛常常产生一种直觉顿悟。他们都爱好冥想,对自然都有一种泛神论般的狂热。他们都为同一类型的爱情心旷神怡,对生与死都进行过长期探索,大自然、爱情、创造是他们生活和创作的主题。他们都坚持独立,追求自由,维护自身的纯洁。他们都迷恋自然单纯质朴之美,厌恶矫情虚饰、喧嚣狂热。他们都是时代的旁观者,都回避政治,注重自我的完善。他们在孤独寂寞中创造艺术,寻找永恒的主题。他们全身都洋溢着基督的灵性与博爱,相信生活中存在着真正的人性和基督教教义所推崇的美德。他们都用超越时代的智者眼光,不仅仅着眼于一个片断、一个事件、一个阶段,而是对整个历史长河作静态纵观,透过社会的变幻莫测,抓住那最本质的、亘古不变的东西。总之,可以肯定地说,日瓦戈不仅作为作者心爱的人物被予以肯定和赞赏,而且是作者的“抒情主人公”,通过他来揭示自己精神和诗学上的自我。在《人与事》手稿中,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4]可见作家的艺术现实来源于他本人的生活体验,将作家与他笔下的日瓦戈相比较中以说明这一点。

帕斯捷尔纳克出生于艺术世家,自小就接触了文艺界许多著名人士,包括奥地利诗人里亚克、作曲家斯克里亚宾、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等。他曾专修音乐,后又攻读哲学,接受了德国新康德学派的教育,但最后成了著名的诗人。在旧俄上层知识分子的教育熏陶下,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与里亚克的亲近,使他后来的诗作中也出现了那种对大地与人类创造物的厚爱,对战争、暴力的恐惧以及对人与自然宇宙和谐的赞美。在斯克里亚宾那里,

他不仅醉心于音乐,而且被尼采的极限与纯粹之类的狂热所吸引,这是形成他独特个性的前提。托尔斯泰对历史和文明的态度及其伦理道德观不能不对作者产生影响,因为托氏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偶像。这些教育与影响在《日瓦戈医生》中得到了深刻的再现,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日瓦戈的成长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尼古拉舅舅。尼古拉关于历史是一代传一代的活生生的现象,人类思维是在不断探索死亡之谜、如何战胜死亡的过程中发展等精辟言论,实际上是作者在德国专攻哲学时的指导老师的见解。

帕斯捷尔纳克是犹太人。幼年时,保姆背着作者的家人带作者到基督教教堂受了洗礼,并参加了种种宗教仪式。在他的一生中作者在1910至1912年最受基督教思想影响,那时形成了他对事物、世界、生活的看法。”帕斯捷尔纳克并不是基督教徒,然而,他在临终前曾向家人提出要请神父到家中为他做安魂弥撒[5](289页)。他的历史观与伦理观是以仁慈博爱、自我牺牲、人性至上、道德完善等为基础的。他认为大自然、爱情、善良与美是至高无上的,相信基督教伦理学所称颂的人的美德,要求用永恒的正义性和真正的人性来观照世界与历史。他说他写《日瓦戈医生》就是要赞颂俄国“美好而敏感的一面”,“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可以预见,他们(父辈和祖先)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6](659页)。

这种价值观念在日瓦戈身上体现为以基督福音为基础的历史观——即社会的发展应建立在以捍卫人的权利、人的本质为目的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之上,以及以善导善、勿以暴力抗恶的伦理观。在他眼里,革命前的旧体制压抑个性、毁灭个人价值,所以当它被摧毁、革命胜利时,他为此欢呼,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痛痛快快地就把千百年来不合理的制度判了死刑,人民从非人的生活中挣脱出来,整个俄罗斯得救了,有了光明的前景。但是他的欢呼并不是从阶级解放的观点出发的。实际上,不管是二月革命还是十月革命,在他看来只应该以捍卫人格,让人的个性不受压抑、自由发展为目的。他的伦理道德观不能认同革命胜利后的一系列问题。他赞同人类应不断超越兽性向前进,但他认为这种前进不应靠武力,而应靠真理的力量——道德感化来完成,如果用暴力将一事无成,人们将为自己的暴虐和罪孽付出沉重的代价。日瓦戈承认革命的正义性,但又不能容忍革命暴力的血腥,在他心目中正如雨

果所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7](397页)但在否定革命暴力的同时，他找不出更有力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找不出巩固和维护革命胜利的武器，于是他陷入了迷惘、徘徊，感到无所适从。他终于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对革命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由于他不惯于反抗，只求洁身自好和拥有独立精神生活，因此他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封闭自我，希望以孤独的艺术创作来显示个人存在的价值。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回到莫斯科度过新经济政策和社会建设时期，他也没有从暴乱的惊悸中恢复过来。他认为当时遍存在的观念上的摇摆不定及行为言论的虚假都是对人性的褻读。他在缄默中反思远去的历史和复杂的人生，悄然地离开了人世。

日瓦戈的生活历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在1917年大变革前期，作者并无政治倾向，他之所以以激动兴奋的心情迎接革命也只是从爱国主义出发，希望俄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内战的严酷现实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背道而驰。在不能面对外部世界的严峻时，他转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并选择那些传统的、永恒的主题进行创作。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加强对文化的干预控制，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用高压恐怖、强制惩罚等过激手段来反对资产阶级文化倾向。文艺界宗派主义情绪浓厚，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排挤打击“同路人”作家，而且内部派别林立，相互倾轧。作者目睹了许多作家在政治潮流中几经几伏，也厌倦了社会生活中那种声嘶力竭的歌功颂绩和言不由衷的随声附和。他力求拥有自己对艺术和道德的思考。30年代苏联出现了恐怖的大清洗，作者本人和女诗人阿赫马托娃、作家左琴科成为文坛重点批判的对象。他在文学界的许多密友甚至发生了不幸：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悲剧性的自杀，亚什维里、曼德尔施坦的相继消失，茨维塔耶娃的悲惨结局，伊文斯卡娅的被捕与监禁等，都使他在悲痛和恐惧中与现实保持距离，避开政治，封闭自我，转入内省。他甚至放弃创作而转向翻译。作者成了一名时代堤岸上的漫步者和观望者，在他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位热衷于自我形象的人。作者在早年就对政治狂热表示反感，始终不理解那种为宣传而呐喊高歌的诗歌。随着对生活的进一步体验，他从30年代起他就不再看报纸，从50代起就不再听广播，完全失

去了对政治的兴趣，几乎脱离了现实社会生活。他潜心于自己的艺术创造，抒发对自然、感情、生命的赞美与感受，着重表现人与自然、人与创造物的契合。他拒绝为了应时和实用而创作，他追求的是心灵与情感倾诉的艺术，因而他的作品常被指责为无思想性，脱离人民。

与作者一样，日瓦戈虽然间接卷入了战争和十月革命，但一直没有主动的政治行动，也无明确的政治态度。他总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政治变动、阶级斗争。他认为政治什么也不告诉他，马克思主义还算不上科学，“当权者为了宣扬自己绝对正确，却千方百计地回避真理”。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他认为观念也应从大自然中产生。就象树和叶随着四季循环而变化但森林本身却依然如故一样，一时的革命战争与政治纷争并不说明什么，也不代表什么，仅仅是历史的一种偶然现象，而在这种种暂时的变化之下，蕴藏着永恒不变的东西，一旦超越了这种历史偶然性，人与大自然就成为一体，人的本质就得到展现。所以他说：“人是为生活而生的，而非为准备生活而生。”他虽然处在历史巨变的时代，但并不投身于时代的潮流，仅仅是去理解而不是去促进去干预。他认为一切现实都应该自然地象植物一样发展，人们只能置身其中去了解、感受、体会。普希金、契诃夫那种纯朴宁静的创作生活一直是 he 追求的梦，被他认为是人的自由、尊严、纯洁和信念的生活化、具体化。他渴望远离尘嚣，沉醉于和谐美满的家庭幸福中，去感受人生与自然，进行劳作与艺术创作，以寻找自我的价值。

正因为作者和日瓦戈都缺乏政治热情，对革命仅仅是关注而不行动，所以他们与革命的先锋分子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作者始终对那些积极投身革命洪流、热衷于抛头露面的革命浪漫主义者反感。他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后期的大部分作品，说它们“形式崩溃，思想贫困”，“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对宣传那么卖力”[4]。对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作者认为是由于他的孤傲，“由于他谴责了自身中的某些事或周围的某些事，而这些事是和他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的”，而“当一个人决定自杀时，就是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布自己的破产，……内存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就结束了”[4]。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作者认为马雅可夫斯基一生的革命狂热对他的自杀有影响，他谴责了笼罩在马雅可夫斯

基周围的那种对人的精神与肉体进行折磨的文学与政治纷争的不人道。由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我们能联想到小说中安季波夫的悲惨结局。安季波夫临死前面对日瓦戈所作的心灵表白和对自己一生的回顾,正是作者自己观点的注释。马雅可夫斯基和安季波夫虽然一个是诗人,一个是革命军人,但是他们对革命的狂热,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钢铁的意志、强烈的责任感与勇猛果断的精神是相同的。在日瓦戈眼中,安季波夫是意志的完美体现,某种思想的化身,但为了表示对革命的忠诚,他压抑自己的情感,扼杀对妻儿的思念,以满足自己成就功业的虚荣心。他认为安季波夫虚幻的政治狂热给他带来的残酷无情注定了他的灭亡,最终要受自我良心的谴责与审判。日瓦戈为安季波夫感到遗憾,认为其自杀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对安季波夫的否定,实际上从反面肯定了日瓦戈对政治和革命所抱的态度。

日瓦戈的积极探求真理的勇气也是作者自己的特点。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表现出独立探索的精神。他曾先后受过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多方面的影响,却始终未被任何一种主义所束缚,而是博取众长,溶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在《人与事》中说,为了不重复、不成为马雅可夫斯基的模仿者,他“开始扼制自己那些与他相互呼应的气质,不使用英雄主义的腔调”。西方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是“唯一幸存而又未被革命迷惑的人”[8](180页),认为他能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在一片暴风雨中,始终不失冷静。他的创作生活,特别是《日瓦戈医生》的创作,正是这种独立精神的一种表现。

可见,帕斯捷尔纳克与他所塑造的日瓦戈在人生观、宇宙观上是相互交融的,为了更方便地表达自己的艺术观点和美学趣味,作者把日瓦戈处理为一位诗人。

作者认为:“艺术主要体现为一种已为感情所取代的现实,因此,它就是这种取代过程的记录。”[9](117页)艺术家是“通过自己的灵魂来倾听世界的”。他反对美学上的实用主义和功利目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刻板模仿和照抄生活。他的诗歌情感炽烈带有不可遏止的冲动,充满了爱,充满了活力,具有自己的风格与情调。他认为题材本身并不能决定作品,一个作家的成功与否,在于题材如何触动他,在于文体的凝炼程度。艺术形式的突破与完美是在艺术家强烈感觉到不得不一吐为快的时候完成的

[6](695页)。作家的这些观点用日瓦戈的话来说就是,艺术最重要的特征是现实性,而现实性的标志则是热烈的感情与独特性,“作品,可以通过题目、论点、主题、人物来表达思想,但主要是通过作品的艺术性来表达”。日瓦戈还认为永恒的艺术,正如几千年未变的原始艺术(象埃及、古希腊艺术),是一种对生活的思考与见解,这种思考与见解能压倒其它成份,而成为作品的本质、灵魂与基础。这种思考就是人们为了避免面对死亡的空虚感和恐怖感而不断探索死亡之谜,“创造活在死者之中的生者”,表现永恒的真善美,表现生存幸福。这种思考是创作的根源,艺术的任务。这正如作者所说,诗人是“宇宙创造精神的旗手”,“虽然艺术家终将死去,但他体验到的生活的快乐是永恒不朽的。如果这种快乐是以一种既有个性又具有普遍性的形式获得的,那么实际上别人也可以通过他的作品而使其复活”[6](695页)。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生命、对自然的热爱,对创造物的狂喜,对永恒人性的追求。附在小说后面的20多首诗,虽然名义上是日瓦戈写的,但它所反映的则是帕氏自己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心境。此外,《日瓦戈医生》中有关诗歌创作的描写都具有明显的自传性,它通过描写日瓦戈在创作中的兴奋、激动、沉醉、情不自禁、忘乎所以等种种感觉体验,揭示了作者自己创作最重要的特点以及在创作中竭力追求的美学趣味。

在美学趣味上,作者坚决不让功利与实用主义玷污自己的艺术。他讨厌装腔作势、矫揉造作,追求单纯真实、自然质朴、和谐统一。在《人与事》中,他说他在写第一本诗集时就“尽力回避浪漫主义的造作和那无关紧要的趣味”。从30年代起他逐渐摆脱早期自己用词雕琢、描述玄虚、隐喻充斥的浮夸之风,向单纯通俗、清晰明朗的陈叙方向发展。到晚年他更强调创作的严谨性,力求做到既含蓄又清朗,并且鲜明有力。他的诗歌感情充沛,具体真实,比喻新颖而又具有口语色彩,没有文学套语,完全是“自然而出自肺腑的,它们如同深沉而又完全正常的呼吸”[10](234页)。在《日瓦戈医生》中,我们也感觉到了作者文笔所具有的吸引力,在他娓娓叙说中,我们慢慢进入角色,与人物同欢喜,同哭泣。作者特别推崇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原因之一就是她的诗十分和谐,诗意清晰明朗,有无限的纯洁与力量,有一种自然而然、一气呵成的气度,这些特点也是作者本人终生追

求的。作为作者的代言人,日瓦戈在写作时也总是让感情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而不靠辞藻来渲染。他不断地寻找适合表达情感的方式,这就是用严谨、朴实的笔法,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掌握诗的内容。日瓦戈的美学观点从他女主人公拉拉自然宁静的举止言行的赞叹中可以看出。日瓦戈所追求的那种天然之美,是人与自然的一体。这种质朴之美,是在任何一个细微之物中都能发掘的简单而又深刻的东西,是永恒的普遍存在的简洁和谐之美。在这一点上,作者和作品主人公是明显地一致。

帕斯捷尔纳克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

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着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我为还债所做的努力。”[11](820页)日瓦戈的气质、精神、思想、诗学等诸方面证明这一形象是作为作者内心的表达者而塑造的,是以作者自己的遭遇、自己的性格特征、自己的思想观点等为蓝本塑造出来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的自传性既是明显的又是内在的:它不体现在作者和日瓦戈之间生活经历和背景方面的相似,而体现在他们之间精神、气质方向的相似。他们的政治观、历史观、人生观、艺术观以及性格特点的惊人相似可以证明,帕斯捷尔纳克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日瓦戈。

参考文献

- [1]王步丞. 风波·悲剧·思考:漫读《日瓦戈医生》[J]. 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7(2).
- [2]帕斯捷尔纳克. 日瓦戈医生[M]. 顾亚铃, 白春仁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3]严永兴(译). 利哈乔夫院士论《日瓦戈医生》[J]. 外国文学动态, 1988, (6).
- [4]帕斯捷尔纳克. 人与事[J]. 乌兰汗译. 世界文学, 1985(5).
- [5]高莽. 帕斯捷尔纳克—历经沧桑的诗人[M]. 长春:长春出版社, 1999.
- [6]卡莱尔, 奥尔珈. 帕斯捷尔纳克访问记[Z]. 帕斯捷尔纳克. 日瓦戈医生[M]. 顾亚铃, 白春仁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7]雨果. 九三年[M]. 郑永慧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 [8]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教研室(编译). 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 [9]薛君智. 从早期散文到《日瓦戈医生》[J]. 外国文学研究, 1987, (12).
- [10]斯洛宁, 马克.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M]. 浦立民, 刘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1]陈映真(编). 诺贝尔文学奖全集:波里斯·巴斯特纳克[M]. 香港:香港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1970.

On the Autobiographical of *Doctor Zhivago*

TONG Zhen

(Xiangtan University Chinese Department, Hunan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outlooks on politics, history, life and art and the personality of Pasternak the author and Zhivago the protagonist in *Doctor Zhivago*, one can see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backgrounds, there are surpris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ir temperament and spirit, an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asternak is Zhivago in real life.

Kew words: Pasternak; autobiographical; *Doctor Zhivago*

[责任编辑:张思武]